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潘群

摘要: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关键词:黄云眉;浙东学派;《明史考证》;教育家

一、生平简历

我国著名学者、享誉海内外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1898—1977),字子亭,号半坡,浙江省余姚市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员。1898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1977年2月20日12时病逝于山东省济南市,终年八十岁。黄先生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学术研究工作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对于古籍整理和官修《明史》的考证,贡献尤为显著。黄先生从十七岁开始,从事小学教育,任教于余姚县立高等小学(现余姚市府前路小学前身)。后又从事于中学教育及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历任余姚实获中学、浙江宁波市中学、南京金陵中学以及宁波市甲种商业学校等校教师。自20世纪30年代肇始,先生专门从事于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历任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教授以及上海沪江大学、上海临时大学、上海新中国法商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教授,并曾任世界书局编辑所主任。1949年5月,黄先生时年五十一岁,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一度回乡小住,被推选为余姚县人民代表,后为求进步又毅然参加华东政治研究院研修。1951年1月,时年五十三岁,始由华东教育部分配至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不久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凡二十六年,除上课教学并带研究生及进修教师研习外,曾专职从事研究及著作工作,直至尽瘁而终。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黄先生曾任历史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校教育工会主席、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曾任山东省民盟副主任、济南市民盟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青岛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主席等社会兼职。因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并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山东省文教群英会、参加山东省国庆十周年赴京观礼代表团。1961年8月22日出席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云眉先生是一位德才兼备与融道德、文章、事功为一的古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堪称为人师表的教育家。他一生为人、为学、为业三方面均可作为楷模,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值得后人学习。他为人外慈而内刚,正直中和而不乡原,虚心谦逊但不迷信权威偶像,

作者简介:潘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93)。

继承传统而勇于创新,紧跟时代步伐,仁爱学生晚辈但绝不迁就,立大志知难而进但为而不争,淡泊名利但严谨求实,真诚尽己忠厚但推己及人而宽恕,善于团结众人共同进步。为学具有宗旨,广博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涉,由经而史,发而为文,兼取诸子百家,擅长考辨,精于明史,著作蕴哲理、史实、文情为一体,堪称“文章九鼎重,神骏万里超”。并具经世学风特征。此外,对于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以及书画艺术、文物考古等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先生于书法,以魏碑与二王为基础,以唐字求法而更爱宋字意放,兼收各家所长融成自己特色,尤显古雅而带有秦汉所具的浓厚金石韵味。对于诗词,先生自幼即喜抱膝吟哦,1919年以来所作数百首之多,以言其志(《史学杂稿续存》附录其中一勾)。平生爱慕苏轼之诗,因以“半坡”为号。所作文言文,情至文美而富神韵,易于琅琅上口,令人余味无穷。程千帆先生晚年尚能全文背诵眉师《邵二云先生年谱》,夏征农先生任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即能背诵云眉先生1959年为《史学杂稿订存》所作的《叙言》。眉师不但学有建树,且“传道、授业、解惑”,以扬雄所言“师者,人之模范”为目标,谆谆教化诸学子,是培养中国文史人才的辛勤园丁。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鲁迅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与李希凡先生,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清史专家金成基学长,文物专家徐启宪学长,前黄梨洲文献馆负责人符伯望先生等,皆是云眉先生的高足。著名文史专家卞孝萱先生年轻时亦曾受到眉师教益,保存有云眉先生于解放前为其亲笔书写的题辞。明史专家李晋华先生,日本著名明史专家阪仓笃秀教授,皆为眉师在明史学业上的传承者。云眉先生勤学善著,数十年来读书札记与发表的论著积百余篇之多,自1929年著成《邵二云先生年谱》以来,陆续出版《古今伪书考补证》、《史学杂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鮎崎亭文集选注》等学术著作凡一百一十余万言,而在史学领域中以明史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完成了二百万字的《明史考证》巨著,为后人遗留了珍贵的传世著作。我们当永远纪念他一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杰出贡献,学习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学、如何继往开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业绩,更要学习他不断探索新知、既继承传统而又创新的学术精神,学习他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自学成才

黄云眉先生的远祖,可以上溯到余姚黄宗羲,世称梨洲先生者,这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也是官修《明史》的实际奠基人。眉师在其著作中尝称梨洲、黄稚圭、黄蔚亭等先生为“吾先辈”(黄稚圭为梨洲玄孙,于乾隆时撰《黄梨洲年谱》稿,黄蔚亭为梨洲七世孙,所撰《黄梨洲先生年谱》即同治年间刊行之通行本)。同时,也曾与笔者语及此事,以明其血缘渊源与学统传承。所以,云眉先生自幼立志继承并发扬梨洲家学的优秀传统和浙东史学精神,并付诸终生实践而终有大成。然而“彝华鱼长研”,传至眉师父亲黄延龄先生时,却是一名手工业工人(银匠),家境不裕,又有子女四人,生活更显困难。云眉先生在子女中居长,为家庭亦为己早寻生计,不得不以学徒为业。但云眉先生渴求上进之心不止,艰辛劳动之余,不顾疲困,经常偷偷看书,亲友们为之感动,予以资助。到十二岁那年才进了私塾就读,十五岁插班余姚县立小学,十七岁毕业留校任教。自此之后,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受过正规文化教育,所以他自己说:“一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自己填表“文化程度”这一栏目时只写“小学毕业”。为此,闹过一桩笑话:华东政治研究院人事干部,见此所填学历并未核审真才实学,即拟将黄云眉教授分配至南京中山陵任工友,一时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才由华东教育部分配至山东大学任教授。不然,云眉先生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历程,又不知该如何书写了。事情虽过去了数十年,但这种仅看表面学历、头衔用人的倾向仍然“阴魂不散”,至今不乏常见,所以,我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当深思为训,痛戒而杜绝之,真正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云眉先生从一位只进过两年学校的青年,到晚年竟成为很有贡献的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其途径完全是靠自学。他总结自己这方面经验时说:“我的成就虽然是那么微不足道,毕竟是从自学得来,不是除了学校就会和‘知’绝缘。”又说:“求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自学,而不是学校。学校的教育是有

限的,而且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受全部学校教育的机会,即使在学校受教育,主要还是要靠自学。”并且进一步指出:“实际的求知时间,是在离开学校后的工作实践阶段。不论做什么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于旧知,必须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不断地求新知,长新知,用新知。”他说:能否受到完全的学校教育,“可以争取,但不能勉强。而自学则占着我们一生求知的的时间,其权则操之在己,我们非努力不可”。云眉先生在这里阐明了四点:首先就人生宇宙时空视野的发展观点,讲述了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认识求知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则是有限的,学校求知并非唯一的途径。其次,就学校求知的途径看,书本与老师的传授也要靠自己独立思考与融会贯通才能接受。再次,就人生道路看,社会工作实践是主要的阶段,而在工作实践中“求新知、长新知、用新知”归根结底是人生求知最主要的道路,这完全要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运用、提高,综合上升而出新。最后结论是:“自学则占着我们一生求知的的时间,其权则操之在己,我们非努力不可。”黄宗羲说:“学莫先于立志”,而且“学有宗旨”,但归根结底贵在坚持到底。张维华西山先生1981年6月3日在笔者藏书《明通鉴》扉页上有一段亲笔题辞就是说的这一点:“读书求学,要有路数,路数即入门之径。有了路数,还要持之以恒,以坚忍不拔之志,贯彻始终。”所谓“宗旨”即“宗致”,“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换言之,即学者的用意所在,是学习者进入这门学问的入口处,也就是张西山先生所言的“路数,即入门之径”。而学贵持恒,要“锲而不舍”,决不“一曝十寒”,做到顾炎武所言:“君子之学,死而后已。”云眉先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他不论任何困难,包括晚年一目失明后直至八十高龄临终前,还认为“求知是苦事,也是乐事”,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活到老而学到老,从未间断过自学和研究。真可谓:“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这种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自学毅力和乐观精神,是他终于成为起程很晚而获得成果较早的一位集大成的学者。

在自学过程中,云眉先生和其他人一样走过弯路。青年时期“只是贪婪地把大堆的故纸,尽往自己脑筋里挤、积,再挤、再积”。他说:“当时以为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博闻之士。欲速则不达,结果,东碰西撞,走了弯路。”患了一般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通病。因而他经常以此为训,告诫诸生引以为鉴,教育我们,一不求名利,二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在私人谈话中,时以“水滴石穿”和荀子“积跬步、积小流”的道理,说明“百川学海”以及“圣可积而至”的精神,勸勉大家勤学。他总结自学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循序渐进”。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本诸朱熹《读书之要》中“循序而渐进”之义,要按顺序一步一步深入;二是云眉先生自己独特的体会,他略去一“渐”字,突出一“而”字,就将“序”字引申为阶段。他认为:“我们要不断求知,但不能跨过学问应有的序。”这就是说,学问一方面要不断地积累,这是“渐进”过程;另一方面有一定的阶段,必须综合学、思、问、辨、行,从而突破和超越,这就是“而进”过程。渐进与而进的整个认知过程,就是不断地平时积累并按阶段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创新的过程,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突破创新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是目标。因之,做学问是一知难而进的过程,是一“自强不息”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归根到底,是突破自己,战胜自我,不断走上新阶段的过程。云眉先生说:“学问的加广加深,是一个和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奇峰乍越,险壑又临,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地挡住了前路。但实际上这些奇峰险壑,无非是学问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可以突破,不能绕过。”实际上,云眉先生正是顽强不断地学而经过了无数的“序”,突破了不少奇峰险壑,才登上学问高峰境界的。

为学犹如金字塔,既广且尖。如何处理博精之间的关系,即基础知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是任何自学求知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博而约知要,广博精深,是每位学者皆要企求的目标。杨向奎拱辰先生曾在50年代有一极致的目标语我:“广博到世界上所有学问我都知道,而专门精深的学问只有我一人知道。”这当然不易做到。1955年,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当面请教过云眉师。先生当即爽朗而明确地回答:“博是精的基础。”并且要笔者看黄宗羲的著作,后来笔者研究黄梨洲,在《万充宗墓志铭》一文中才见到:“学不患不博,患不能精。”“由博以致精。信矣,其何传也。”求学当然要

博通而不杂,精深而不粗疏,求学的目的是创新,从而将学术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关键是基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广博基础,没有这个如金字塔式的广博基础,也就没有金字塔式的高尖创见。梨洲所说:由博而精的学问,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可以传世后人。云眉先生就是这样教诲我学《明史》的,他让笔者至少先读完《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左传》等书,打好通史基础再攻读《明史》。为此,在笔者大学二年级时,云眉先生批准笔者休学并专门写信给他的好友、前中央图书馆馆长缪镇藩先生,请他介绍笔者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专家阅览室看书,从此笔者每天风雨无阻在馆中坚持自学了整整两年,攻读《明实录》旁及明代文献,在实践中稍涉版本目录之学,并在馆中拜识了在此阅读的胡小石先生、陈中凡先生、陈鹤琴先生、邹树文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得到教益匪浅。尤其是徐复先生当时正值年富力强,交谈最多。云眉先生让笔者在图书馆里泡了两年的生活,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编外研究生的实践”,为笔者大学毕业后的自学生涯和“泡图书馆”的习惯以及治学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云眉先生早年的自学生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先生所走过的治学历程,所经历的“序”,更广博、更精尖了。他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博”,二是“辨”,三是“精”。他曾说:“余三十以前,泛滥群籍”,“三十以后,稍涉考证之学”,如是者又十年,不幸寇氛东来,山川变色,深感“南冠低压”,因而“欲借一代之史,殫精其中”,着手著作《明史考证》。他博览群籍“广及四部”,由经而史发而为文,将经、史、文融贯在一起,经过自己的分解与化合,究心于另一种特色的深湛之思、贯串之学即独创性的见解。他承继学统而尊重师道,又能轶出学统藩篱,善于对待各家学说的异同,敢蹈前人之未越,将汉代经学训诂求真的方法致力于贵创见的目的。他以经学为本,必证明于史、突出史学为中心,学用一致,为实践服务。因之,他的任何一种著作都显示出哲理、史实、文情三者的高度统一。同时,应指出云眉先生在打基础上所注意的音韵训诂学及版本目录学。解放前,他为世界书局编辑《辞林》一书,曾对《康熙字典》的引书进行了通校,在前人检出所误者 2588 条的基础上,又增检所误者五六百条,而属于形义音切之误者尚不在内,因撰《康熙字典引书正误》一文,刊行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上。此外,还写过《齐楚吴三大地区方言考》一类文章。对于外国语言文字,因未受过中、高等学校正规教育,最初并不识 A、B、C,直到四十岁之后才自学了英文并能检阅字典读外文书刊。至于目录版本学,可以说是读书的门径。前人读书从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始,童书业先生让笔者从背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无非要我们读书必须知书,而知书又必须择书,就好像今天带研究生,首先要开个书单一样,必读哪些,精读哪些,先阅哪些,后阅哪些,旁涉哪些,参考哪些,凡此等等,对于浩如瀚海的古籍,不懂目录版本是难以在治学大道上前进的。云眉先生早年读书,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1930 年他亲登天一阁观书目录。在山东大学任图书馆馆长时对编目工作十分重视,在历史系任系主任时对图书室资料建设甚为关切。笔者到南京图书馆看书,临行前,他向我简介了柳诒徵翼谋先生及金陵大学李小缘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江苏国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目录》,并叮嘱说:“南京图书馆藏明人文集极多,必须注意与《明史·艺文志》相校而考证。”他为著《明史考证》,先作了《书目索引》、《明实录人名索引》、《明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先生和图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解放前公私图籍之聚散概况》等文章。

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尖的专门学问的获得,需要解决学习方法问题。云眉先生曾把“多思多问”列入自学经验的第二要旨。他指出,要读书得“问”。所谓“问”者,首先是指读书时经过自己认真思索所发现的问题。读书发现不了问题,原因即在于读而不思,没有从广度与深度领会著书人用意所在,并联系自己所学与他书所述相互联系,找出异同。这里,以此书与彼书“对着看”是“得问”的重要学习方法。其次是指经过融化众说而独立思考悟出自己富有新意的“心得”,按先生的说法就是“读书要有所得”。为此,将此所得及所余疑问请教他人和相互交流,这就要“多问”。古人治学,历来按照《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应遵循的序,是学、问、思、辨、行。而先生则根据《论语》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自身自学的体验,认为应该是“学、思、问、辨、行”,将“思”字重点突出。“思”即古人所说之“心”,《说文》释为“审”为“虑”,也可理解为“智”

或“知”。如果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考虑,思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特征。思与行的关系,换言之即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人类认识论中的核心,思想指导行动,在行为实践中又检验思想和提高思想,社会实践与学术实践,经过综合升华反映客观规律成科学法则,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总结时空智慧,即总结传统与现实的成就,昭示未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产与消费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及其表达方式,也包括遗存在内。就广义来说,传统与现实的衔接点,就在于总结继承与扬弃,在于总结宇宙空间变异与创新,在于如何“思”,在于集众智成圣和学与思的关系。章学诚所言“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焦循所言“学贵善用思”,就是指集思广益并经自身独立思考出新论的重要。包括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思想、意念、理论在人生宇宙中继往开来的焦点作用。因之,无论就学知、长知、用知的过程与效果看,应当特别突出发扬“思”的关键作用。云眉先生在实践中,就是这样力行的。他在1929年所著第一部著作《邵二云先生年谱》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特点,重点阐述了邵晋涵其人的学术思想。东南派史学大师柳诒徵翼谋先生为是谱所作的《跋》文中,即阐明了云眉先生这一特色。其文云:

采香群书,编次一先生之年谱不难,难在若人之学术思想独到之处,辨章扬榘,有以推见至隐,史公所诏好深思,心知其意,亦浙东史学所独擅。胥沫是篇,南江精神为不死矣!

学、思、问、辨、行,单靠记忆力是不够的。云眉先生说:“不能迷信记忆力,应当强调发愤和勤勉。而坚持作札记就是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写札记,不仅可以帮助记忆和养成勤勉的习惯,同时能把所学的庞杂、分散、无条理、无联系的东西,经过审慎别择,成为后来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料。先生写下的无数札记,可以说是他大量著述的基地和泉源,有的经整理后即成为学术专著,如《史学杂稿续存》、《鮑琦亭文集选注》等,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札记手迹,字字端正,笔笔不乱,也可见他对札记的认真程度。无怪乎他把“勤于札记”作为他自学成功经验的第三要旨了。当然,正确的学习方法,说到底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指导我们把知识结合实际,把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运用到业务工作上,又通过实践不断检验来充实它,提高它”。他把学知与用知作为一个整体,将实践作为检验知识的尺度并作为“长知”的必经过程,将实践作为进一步充实知识、提高知识、创新知识的新起点。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就是我们在认识论中应得的结论。

云眉先生在自学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是在艰难曲折中摸索前进的。中国旧学传统,荀子齐学重师承,鲁学则重经本。而云眉先生青少年时,既要克服“学无师承”的困难,又要克服无钱购书和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苦恼。他为了借一本书,往往跑到几十里之外,书主人不在时还要空跑。借了回来,与其说是借书,毋宁说是抄书,不仅是摘录有关资料,而且是整部整部地抄,和每位学者一样,手指间的老茧是抄书岁月的标记。1929年在宁波,他为借书访藏书家冯孟颀先生时的心情,有诗一首可证:“荒乱饥驱但自哀,逢君不觉倦眸开。旧家庭宇燕双至,处士生涯书四堆,故简似留秦世火,残碑多带汉时苔。酸咸我亦殊人好,竟许幽扉数数推。”能得到借书的许可,云眉先生是何等的喜悦,并由此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其次,在自学过程中要同“病”作斗争。他十七岁患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一直到二十三岁才治愈。1961年《明史考证》初稿完成,正想进一步扩充提高时,左眼患“白内障”失明,他仍不改其乐观的态度,反而更加孜孜不倦地进一步进行撰著工作,如是者十年,终于在1971年七十三岁时定稿完成了《明史考证》这部二百万言的巨著。再次,是同“老”作斗争。他五十三岁到山东大学工作,在历史系各位先生中,年龄居长,后来头发渐白,但精神和劲头仍如青年一样。他常说:“我不怕头上的白发,但必须和思想上的白发作斗争。”“白发不是年老的标志。只有停留,才算真年老!只有前进,才配称年青!”他在山东大学工作二十六年,也是同衰老作斗争的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却是他出成果最重要的岁月。他的夫人徐飞卿先生于1971年庆贺他《明史考证》完稿时,有诗云“二百万言衰后笔”,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是在晚年同衰老不断斗争中,完成这一宏帙巨著的。

三、《明史考证》

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合义理、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的浙东经世之学。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使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融合为一体,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特色,从而经世致用。因之,云眉先生的任何著作皆富有这种特色,经学、史学、文学之作无不如此,考证亦不例外。他的考证,既不同于汉代经学单纯以训诂字义释经的墨守教条之习,又不同于宋学流弊主观任意臆测义理的虚浮作风,更非囿于清代乾嘉汉学考据校讎文献、辨伪文献的局限,而是将考证求真的方法致力于贵创见的治学目的。用云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求真而已,非求胜也。……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盖古籍真伪之辨,犹为今日董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也”,“盖举所有古籍,一一探其源流,穷其所以真伪之故”,“古籍真伪之辨,尚需继续……使丰富之古籍能正确效其用于今日云尔”。并云:“是非之公,具在人心。”这是从云眉先生《古今伪书考补证》中的《序》及《重印引言》中所摘引,可见云眉先生求真求公之情集中在文献辨伪对于读书与董理文献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上,并非为考据而考据,是为经世致用考辨。但更深层次的考证目的,就不单纯局限于文献范围,而扩至于史实辨正以及书籍蕴含用意的发微了。最明显的诸如《李卓吾事实辨正》、《读广论语骈枝微子篇质章太炎先生》、《辨宋祁汉书校语》等文,更集中表现在《明史考证》这部云眉先生的代表性巨著上。他在此书“代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明确指出:

《明史考证》致力之中心,在提取《明史》范围内所包含之若干问题,根据《明史》已采用或未采用之可靠资料,作较深入之探讨,俾将进而揭发明代封建统治之真实面貌及其本质,此与累朝旧史考证专为旧史要求服务之目的,截然不同,故首奠之。

云眉先生《考证》的宗旨用意,与其著《邵二云先生年谱》的浙东史学精神一样,在于“辨章扬榷,推见至隐”,借考证是书体例,阐发云眉先生对《明史》是书与有明一代历史的看法与评论。因之,笔者以为《明史考证》绝非是一部单纯的考证之作,而是一部明史专门的学术论著。独到之处在于借用不同于一般论著的考证体例,融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体而已。无疑,我们从中可显然看出云眉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云眉先生解放后以学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的学问宗旨。

《明史考证》的著作过程,历时凡四十年之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1931年著《明史编纂考略》。第二阶段,日寇侵略,故乡沦陷。于1941年在上海开始动手撰写《明史考证》。第三阶段,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任教,于1961年完成《明史考证》初稿,1971年完成定稿交中华书局,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出版,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79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一册,至1986年8月出版完第八册,是书终告全部问世。

1931年,云眉先生有感于《明史》一书,清代学者以其钦定之故,率有褒无贬,或箝口不道,以远疑忌。而赵翼以为近代诸史“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不免回护《明史》,评论不公。故云:“余拟博览明代官私记载,将《明史》所用材料一一加以勘核,成《明史考证》一书,以确定《明史》价值。”因作《明史编纂考略》,“兹先揭其编纂始末于此,就正宏达,亦以见赵氏所言之非为实录,而《明史》之不可不重加估计云”。全文首叙《明史》纂修过程,创修于顺治二年五月至康熙四年为初期;而后至康熙十八年开局明史馆于东华门内,迄康熙末年为《明史》纂修中期,是大规模修史时期,同时又是成绩最大的时期,为今本《明史》奠定了基础。而后,从雍正元年始下迄乾隆五十年止,为《明史》纂修后期。其中第一期从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张廷玉进呈修改王鸿绪之三百十卷稿即今之三百三十六卷本;第二期从乾隆四年今本刊行后,又有修改、考证之议,复于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纂修《明史列传考证》本二百十六卷以及三百六十卷新定本,故复有故宫博物院景印之重刻殿本《本纪》,以及王颂蔚于光绪年间据《明史列传考证》而成之《明史考证摭逸》之刊行。其次,眉师在此文中就“总裁之攘窃”与“时

主之箝制”两节事迹中指出,《明史》第二期编纂过程中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总裁名为王鸿绪实盗誉于万斯同。其二是清帝控驭史臣,因之“《明史》乃无信史之价值可言矣”。该文刊载于1931年《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二期,在史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顾颉刚先生阅后,极为重视,叮嘱并指导其弟子李晋华先生认真研读,并在眉师此文基础上扩而成为《明史纂修考》,晋华先生由此起点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而顾颉刚先生与云眉先生之间友谊更深入一步,解放后顾先生到青岛度假,住在云眉先生家中,仍然关切《明史考证》撰著进展情况。1980年9月,颉刚先生已在病中,笔者与眉师公子黄汉充先生专程赴北京南沙沟顾府,谒见了颉刚先生与顾师母,进呈了刚出版的《明史考证》第一册,以竟顾、黄两位老先生共同的夙愿。

1937年,日寇侵略中国,年底南京沦陷,云眉先生避至和州,赋诗中有“百里烟尘暗,千家骨肉枯,衣冠迁赵宋,草木走秦符”之句。岁末在友人刘君之村度除夕,降雪又作一绝:“如此江山如此身,可怜四十作逋民。不知今夜他乡雪,飞著愁颠定几人?”1938年旅次安徽他乡书恨云:“东风无赖柳花妍,故国艰难又一年。马上幽并羞妇女,舟中李郭泣神仙。颍城血肉碧春草,宰客须眉黄暮烟。只有忙忙南去燕,犹思寻觅旧堂前。”归乡途中过茅山,又叹曰:“胡马从东来,衣冠飒以替。山水俱蒙垢,何心敦宿契。”返乡对月,感梨洲等先辈率世忠营子弟兵抗清,从亡鲁王于海上于深山的民族气节,联系当时国土破损之恨,又吟道:“海气黄俱尽,清光下树端。不堪秋破碎,还对月团圞。壮士随鹰隼,高楼谢绮纨。越王风烈在,肝胆好相剗。”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当时云眉先生对因日本侵略所遭“山河变色”民族仇恨无处泄愤的情状。当1941年故乡沦陷避居上海之时,他深感“寇氛东来,山川变色,余避地寄食,南冠低压,俯仰无赖,始欲借一代之史,殚精其中,束制念虑,强图安帖”,于是正式动手撰著《明史考证》一书,“藉减南冠之恨”。由此可见,云眉先生于第二阶段着手撰著《明史考证》,用意是为了民族之恨,是鉴于清之修《明史》,因史臣受满清贵族统治者箝制,忌讳、曲笔民族矛盾上升实质,又鉴于当时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矛盾上升,是“发愤”之作。总之,体现出著者寓意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可是,这样一部寄寓着作者无限爱国热情的著作,在“文革”时期,竟被别有用心者“立案”审查,我们只能赘引当时云眉先生的《诗》与是书所写的“原文”以明辨之。

1951年云眉先生至山东大学,一方面任教,一方面著作《明史考证》并培养人才。至1961年,又历时十年之久,完成《明史考证》初稿。之后,经反复修改补充,又历时十年,于1971年终成定稿,于1972年交稿中华书局,整整五年,音信杳无,到1977年2月上旬始接书局函知:打倒“四人帮”,决定出版是书。而先生已卧榻多日,病重昏沉。师母徐飞卿先生附耳告之数遍,竟不知先生是否领悟。先生于同月20日溘然长逝而终未见是书出版。

《明史考证》的体例,云眉先生说:“亦无申述之必要。”但从先生所云:《明史》体例,“以徐元文兄弟之《修史条议》、王鸿绪之《史例议》为两大骨干,兼酌取诸家意见而成。其议订之过程,及体例之善否,可参阅近人所辑《明史例案》一书。余一九三一年撰《明史编纂考略》,又尝榷论之。今撰《明史考证》,不复申述体例,以免重复”。综合上述,所言的《明史例案》当为1915年刘承幹先生所著《明史例案》九卷,刘氏嘉业堂刊本。徐元文兄弟条议,凡六十一条,其《序》见徐乾学《憺园文集》。而王鸿绪《例议》以及汤斌之《明史凡例议》等,诸如此类,均可见眉师的《明史编纂考略》所录的精华。但钦定《明史》实肇基于康熙时期,实际总裁并非王鸿绪之流,而是黄宗羲所遣入馆弟子万斯同季野其人。云眉先生说:“斯同以一生所学,历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南雷诗历》中载梨洲《送万季野北上诗》云:‘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乌背日光飞。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旂。不知后会期间日?老泪纵横未有归。’”

黄宗羲晚年不应清廷累召,全力著述,总结历史兴亡得失,注重整理明朝故国的历史,以古鉴今,启昭未来。除对万斯同入京寄以厚望外,对《明史》供给史料,推荐史才,商榷体例,审核史稿,应是官修《明史》最初奠基者之一。而源于梨洲史学渊源并得其传承的万季野修史主张,实为明史馆诸史臣的《明史》体例的源本。云眉先生说得好:“当发凡起例时,其大部分必为斯同所主张,而馆臣意见之

贡献,亦可想其泰半取决于斯同。”因之,应以徐氏兄弟《条议》所本的万季野之修史法为《明史》的体例。这一点,在研究《明史考证》体例时,必须首先明确之。

《明史》第一难事,厥为史料之搜集,而后为史料的选择与辨别。众所周知,修史取材凡计有三,钱牧斋有云:“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然而,正如张岱在《石匱书自序》中所言:“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谏,野史失臆。”必须以国史、家史、野史互相参证。明代大史家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有一段精辟之论,云:

国史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谏而善溢真,其赞宗阙,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的典章制度,参野史的是非之论,征家史的人物,并考以年月综核以史实,这是修史取材必须具备的标准。而《明史》取材众途,但基本史料在《实录》与邸报,而其修史体例本诸万季野修史之方法:“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方苞《方望溪文集》所载《万季野墓表》中更有一重要之言为:“要以《实录》为指归。”徐元文兄弟《条议》据此而云:“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诸家以成一,所谓博而知要也。”

由此可见,《明史》纂修的体例及基本方法已如上述。而《明史考证》的体例及其取材考辨的基本方法,亦同上述并考史源。然而,其不同之处与注重之处,在于参之《古今伪书考补证》之法云:“列他文于前,缀己说于后。”实际足按照本义、他义、我意三序排列并融为一体,先列原文,次列他人、近人之文,然后以按语形式表达著者己见。而《明史考证》的体例,是先列《明史》原文,再列官私记载材料原文并注明出处,最后则以万斯同修史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著者的《按语》为己见。这部《考证》,根据《明史》的次序,首为《纪》,次为《志》,再次为《表》,最后为《传》。根据眉师50年代初与笔者私人的谈话,《序》应是全书的纲,而《明史考证》无《序》,以《本书内容挈要》代序,则应是此书总纲。又眉师1955年教笔者读《明史》,所本乃是“以纪为纲,以传为目”的原则,核以《考证》,当以《本纪》尤以《太祖本纪》与《成祖本纪》为注重之处。

总之,《明史考证》的《按语》特色,不仅据国史、野史、家史等官私记载原文注明出处,加以考辨,提出自己的史断,也不仅限于史料、史实的辨伪和评断,而且在于通过《按语》,明显地表达了云眉先生对此处所引历史的见解,因而融史料、史实的辨伪与著书人的“史断”即“史识”于一体,使义理、考证、辞章三种学问高度统一,继承发扬了黄宗羲的“一贯之学”与经世学风,使哲理、史实、文情合而为一,古为今用而昭示未来。

《明史考证》巨著,初始于1931年,定稿于1971年,凡历时四十年岁月,迄止1986年8月方由中华书局出齐而终告全面问世。由始迄终凡五十五载矣!著书人自三十三岁始,迄1977年2月20日长逝,历时近四十七载岁月,耗尽毕生心血,终未见自己劳动成果问世而抱恨作古,不竟悲愤之至。1978年夏,笔者赴母校整理先师遗著,曾赋诗一首怀念吾师教诲之恩云:

慷慨辞家载笔行,欲将心力事长征。
重游黉舍几窗净,珍视青衿手泽存。
一代文章推祭酒,两京学术重师承。
百家此日争鸣盛,遥想精勤乐业成。

恩师离我们而去,已三十四年,而笔者愧对老师谆谆教诲恩泽,学无所成。但想到《明史考证》已成为全球学者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必读著作,而且必将永传后世,若云眉先师有灵,当含笑于九泉!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